



中共集體領導和
權力更替的常規與變數

(導言)

六十年代初，有人請美國未來學創始人之一的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 預測：“美國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初將有什麼事件發生？”以思維敏捷著稱的貝爾如此回答：“在 1972 年、1976 年、1980 年、1984 年、1988 年、1992 年、1996 年、2000 年、2004 年、2008 年、2012 年……將會各有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在當時，能夠這樣制度化、常規性民主選舉的國家屈指可數，其中大多為西歐、北美國家。貝爾所表述的通過選舉以取得權力和平過渡的政治運作揭示了預測一個國家穩定發展的關鍵。（注 1）

半個世紀以來，民主選舉已不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而逐漸成為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政治制度。東歐、南美眾多國家的民主化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版圖。亞洲國家的日本、韓國也已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人口大國如印度、印尼、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民主選舉又使全球人口的大多數都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權利。眼下正在進行的“阿拉伯覺醒”還可能進一步增加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儘管各國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不同，孫中山先生近百年前關於民主的著名論斷“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為當今時代的政治現實。

然而，中國在過去百年探求民主的過程中充滿了失敗和挫折。儘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的奇跡確實帶來了政治和社會的進步，但讓世界有目共睹的只是經濟

的飛躍，而不是政治的發展。國家領導人也承認中國經濟增長和政治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用溫家寶總理的話來說，這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注 2）因此，探討中國的政治進程，尤其是中共的發展變化，事關重大。

有人或許會說中共的權力轉移也已逐漸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和全國人大換屆，每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人代際更替也可謂約定成俗。但是，中共的權力轉移更多的是派系間的交易，或“暗箱操作”，而非選舉的結果。中國政治發展的滯後現象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觀察。用中國官方的話來講，中共必須面對和適應世情、國情和黨情的新變化。

世情、國情和黨情的挑戰

從國際層面看，一黨獨大的專制制度所造成的負面國家形象也成了中國發展的障礙。人們很難想像，隨著其新興世界大國的角色和意識日益清晰，中國會繼續甘心與那些落後封閉的共產黨國家和極少數聲名狼籍的集權國家為伍。並且，中國目前還沒能建立起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體系，而這種價值體系是中國“軟實力”必不可少的內涵。中國崛起後是否能獲得二十一世紀的領先地位，最終將取決於中國能否達到世界公認的治理規範，包括政治多元化、開放、法治、人權、新聞和信仰自由、透明度等。正由於此，近年來眾說紛紜的“中國模式”難有共

識，更無定論。

從國內層面看，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新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差距在不斷擴大。自然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大規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會老齡化、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不足、以犧牲民管企業為代價而迅速擴大的壟斷性大型國企、官員腐敗盛行、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以及民族衝突等，都需要更有效、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更新。

從黨內層面看，中共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似乎不在於外部力量而源於內部因素。過去的 30 年中，中國已逐漸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由德高權重者“強人治國”向“集體領導”方向轉變，終止了中國歷來由一人專權的歷史傳統。當告別強人政治之後，集體領導不可避免地帶來更多的派系競爭和聯盟的建立，派系之間的妥協更為常見。中共黨內機制建設並不意味著派系矛盾的減少，恰恰相反，它使得派系政治變得更為激烈：政治角逐和遊說業已通過各種形式展開。對於一些政治精英和大眾來說，要適應新的遊戲規則並非易事。在民眾積怨日深且對未來期望日增的情形下，中國在煽動性的宣傳面前極為脆弱。一些政治人物總想利用公共資源來謀取私利。國內外許多中國問題學者注意到，包括黨內民主在內的中國政治改革自 2009 年秋中共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以來幾乎未取得任何進展。全會通過的一些願景和計劃幾乎沒能得到貫

徹，甚至未做進一步討論。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

對中共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的批評，儘管不無其道理，但往往忽視了中共內部近一二十年某些積極和潛在的深遠變化。最重要的是，集體領導的多元利益體系正在形成，其中不同的派別的競爭主導著權力、影響力和政策調整。2002 年中共十六大期間，從江澤民的第三代領導人向胡錦濤的第四代領導人的權力交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首次和平、有序而系統的權力交接。如果即將到來的下屆權力交接能夠取得與上次一祥的成功，並在未來幾年中有效應對挑戰，對中國的領導層和整個國家都將是一大鼓舞。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再次實現權力順利交接，也將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刮目相看。

即將到來的 2012 年秋中共十八大和 2013 年春十二屆人大的權力交接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領導人換屆的規模上。在黨、政、軍系統，即政治局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這三個最重要的領導機構中，70% 的成員將實現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齡。2013 年後，負責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事務、經濟與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軍事行動的頭面人物中，大多數都將換成新面孔。此次最高層的權力交接將是 30 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誰將是這些最高領導機構最有希望的候選人？新晉

者的主要性格特徵和晉陞標準是什麼？我們能否敏銳地預測出可能的領導集體陣容和權力的派系分佈情況？新一屆領導團隊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新一代領導人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中國的政治運作方式？本書從人事變化角度深入探討上述問題。

正如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其他事情那樣，中國領導層的更替既給人希望又讓人擔心。“希望”是因為下一代，即“第五代”領導人較之上一代領導人，學業專長和政治背景更為多樣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基於改革開放時期的高等教育和工作經歷，在政策選擇上會更具全球視野。他們可能會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民主治理做出影響更加深遠的貢獻。“擔心”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日益增長的思想多元化和各類政治精英的不斷增加，不僅使領導層達成共識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會引發人們對領導層是否團結、這些精英人物能否凝聚民心的嚴重憂慮。領導層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可能會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政策分歧則可能使決策過程更加冗長和複雜，甚至陷入僵局。在人事任命尤其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委員的任命上可能出現激烈角逐，派別間的內鬥可能失控。因此，在具體分析和預測人事變化之前，有必要對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制度化發展，尤其是所謂的黨內民主的概念和實踐作一個概括性的評估。

中共黨內民主：粉飾還是現實？

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頻繁使用“黨內民主”一詞來描述中共內部制度上相互制約的概念。2009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四中全會號召發揚黨內民主，把黨內民主看作是黨的“生命”和該黨能否維持領導地位的關鍵和決定性因素。（注3）雖然十七屆四中全會上沒有作出突破性決策以提昇中國公眾對黨內民主的前景的信心，會議確實產生了改善共產黨執政的具體計劃。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三個方面明確提出要求：1) 在選擇中共官員方面要有更具競爭力的黨內選舉；2) 一個更有共識基礎的被稱為“票決制”的決策過程；3) 規範任期、調任、以及高層領導人的區域分配方面更為嚴格的規則。在以上這些領域，有人可能假設所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辭，並仍會繼續受到中共當局的操縱。然而，與此同時，也有理由認為，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潛力。它們在今後幾年，尤其是十八大期間，在決定中共精英領導的政治行為、權力變換、以及決策過程轉變中，可能會極為重要。

1) 有多名候選人的黨內選舉（差額選舉）

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智囊承認，黨內民主的核心在於黨內選舉的擴大。黨要“健全黨內選舉方式，規範選舉程式和表決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進候選人，並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事實上，自從1987年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共當局採取了一種多候選人的選

舉方法（差額選舉）來選舉中央委員會。例如，如果最高領導層計劃有一個 350 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他們會提名 370 位候選人。20 名獲得最少票數的候選人將被淘汰。

中共領導人經常暗示在未來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中會有更多的候選人。2002 年的黨代會上中央委員候選人比席位多了 5.1%，而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多了 5.7%。在 2007 年黨代會上，代表們從 221 名候選人中（多了 8.3%）投票選出了 204 位正式委員。至於候補委員，代表們從 183 名候選人中（多了 9.6%）投票選出了 167 名候補委員。人們普遍注意到，在這些選舉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權家庭出身的領導人，在中國被稱為“太子黨”官員。例如，在 1997 年黨代會上，幾名太子黨，包括陳元（陳雲之子）、王軍（王震之子）和薄熙來（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敗的候選人中。雖然（或者是因為）他們的父親都擔任過副總理，他們都被淘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太子黨”背景的領導人一般對黨內民主比非太子黨的同僚要少有熱情。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類似的方法將適用於在不久將來的政治局成員的產生，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媒體也大量報導了差額選舉和省、市各級領導的重要崗位的選舉。早在 2002–2007 年，江蘇省，特別是其省會——南京，在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的領導下是一個差額選舉的試驗區。好幾個縣或在南京城區的負責人是通過這樣的方法當選的。2009 年 9 月，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前夕，363 名街道社區的黨委委員進行了當地

黨的領導人的直接選舉。官方媒體稱這一大規模的直接選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在的中共組織部部長和第五代重量級領導人李源潮是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2) 票決制

黨的重大決策也應在各個層面上由黨委投票表決。保證決策過程中的集體領導的原則，規定所有關於社會經濟政策的重大決策、大型建設專案、重大財務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應在黨委會或常委會上以“票決制”，而不是隨黨委書記的興致及偏好做出。這項措施旨在防止黨委書記——“一把手”的權力過分集中。作為這些規定的一部分，委員會成員應有三分之二出席會議，任命一位候選人則必須獲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確認。例如，在 2009 年 3 月，對浙江省黨委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 名市級和局級領導。這種中文媒體描述為“一人一票”的做法，為常委會成員賦予了和黨委書記相同的權力。2011 年河南省委也以“票決制”的新機制決定鄭州市委書記和市長的人選。

3) 體制化條例和非正式慣例

幹部管理機制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規範條例，以減少各種形式的偏袒和終身制。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體制化發展已在實施中，它們包括：

- 任期限制。除了極少數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經在黨和政府的高層職位確立了。此外，一位領導連任同一職位

不能超過兩屆。同一層次領導職位連任不得超過 15 年。

- 退休的年齡限制。根據中共的條例和規範，高於一定級別的領導不能超過規定的年齡限制。例如，所有在 1940 年以前出生的黨代會的中央委員要在 2007 年退休。各省主要領導（省委書記或省長）退休年齡為 65 歲，副省部級領導幹部退休年齡 63 歲。

- 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的地區代表性。自 1997 年以來，中央委員會有一種強大政治慣例，每個省級政府有兩個正式的成員席位（通常是省委書記和省長）進入中央委員會。雖然省級領導後來可能會被調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轉任，這種分配原則在中央委員會選舉時被嚴格執行。

- 選舉當地最高領導時的“回避法”。省級或市級的黨委書記，當地紀律委員會書記，公安局長，往往是從中央政府或其他省／市調來的非本省／市籍官員。

這些制度化的規則和慣例，不僅在選擇領導人時提高了連貫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讓中國的政治精英在權力位置上的流動非常快。由於在關鍵的中共領導機構中的成員具有流動性，任何個人、派別、機構或地區都不能主宰權力結構。這些制度的發展加強了檢查和平衡中國領導人的規範，對政治精英們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中共領導層採取了這些措施讓黨內民主不僅僅是政治修辭，在實際運作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礙。黨國體制最強大的機構中的席位，仍由極少數最高領導人通過“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開競爭決定。在缺乏新聞

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監督的信譽和有效性都嚴重受損。

黨內分派：不是選擇，而是現實

在一定程度上講，而今黨內派系競爭的興起並非選擇，而是現實。強人政治的終結必然意味著派系政治的活躍。中國當今政治不容否認的特點之一，便是共產黨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鐵腕人物領導。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形成了兩派非正式的聯盟，他們“勢均力敵”、分掌權力、集體領導。這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龍爭虎鬥”。當然，共產黨內部存在權力爭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不同的是，如今的這種爭鬥已不再是贏家通吃的“零和”遊戲了。

中共高層的這兩個集團或聯盟可以被劃分為“平民派”和“精英派”。國內家喻戶曉的“團派”和“太子黨”又各自是這兩大聯盟的核心。“平民派”目前由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領導。這一派的核心成員包括第五代領導人中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和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人們將之稱為“團派”，因為他們都是通過中國共青團而步入高層政治生涯的。“團派”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裡佔了23%，在政治局裡佔了32%。大多數“團派”成員都曾在比較貧困的內陸省份擔任過地

方或省級部門領導職務。很多“團派”成員都精通於組織、宣傳和法律事務。

“團派”的高層領導人都被視為胡錦濤的“心腹”，胡錦濤本人也是“團派”的一員。80年代初，胡錦濤擔任共青團中央領導時，多數“團派”成員都曾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團派”成員擅長於組織和宣傳工作，但是欠缺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的經驗和能力。在江澤民時代，他們並未得到重用，因為當時吸引外國投資和面對經濟全球化是壓倒一切的要務。而如今，由於中國社會動盪和政治緊張的風險有所上升，他們的作用也開始日益凸顯。

“精英派”誕生於江澤民時代。儘管目前該派的兩位領導人——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政協主席賈慶林——很少為國外所知，但他們卻都是國家最高層政治領導人之一。第五代領導中的“精英派”核心成員包括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副總理王岐山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他們都被稱為“太子黨”，因為他們都是前任領導人的後代。例如，習、王和薄的父輩都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現在“太子黨”在政治局中佔了28%的席位。大部分“太子黨”都成長於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並且在金融、貿易、外事和科技行業有所建樹。儘管“太子黨”成員之間的庇護關係並不總是十分密切，但他們都需要維護自身利益，特別是在民眾日益反感裙帶關係之時，這種共同利益關係就把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了。

現在政治局的六位第五代成員中，三位屬“團派”，

三位屬“太子黨”。他們都是十八大常委的候選佼佼者。這兩派在政策上的分歧猶如他們的背景一樣懸殊。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之間的差別反映了中國兩股社會經濟勢力在不同層次上的力量角逐。“太子黨”更傾向於增加企業家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而“團派”則經常呼籲建立和諧社會，更為關注諸如農民、農民工以及城鎮貧困人群等弱勢群體。這種現象可稱為“一黨兩派”模式。

2007年十七大時中共決策層一反常規，摒棄了黨內以往一貫的直接繼任程式，確定了兩名而不是一名接班人：習近平和李克強，當時兩人均為50歲出頭。他們同時進入了孕育未來最高層領導人的政治局常委會。2012年舉行十八大黨代會之後，這兩人必將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分享權力。估計習將成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候選人，李將接替總理溫家寶。儘管這兩位第五代領導人在家庭背景、政治人脈、領導才能和政策取向上都有很大差別，但是他們各自都將會對經濟政策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接下來的10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們有望帶領這兩個互相競爭的派系去描繪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宏偉藍圖。

習近平和李克強在施政綱領上存在明顯分野。習近平對市場自由化和深化發展私有經濟的熱衷在國際商界裡眾所周知。順理成章的，他把政策關注點更多的放在了提高經濟效率、保持GDP高速增長、擴大市場開放和促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之上。習近平特別在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財富精英階層。

相比之下，李克強則較為關注弱勢群體和陷於困境的失業人群。他意識到了建立一個覆蓋城鄉的社會基本安全網的重要性，並從提供基本醫療開始，著手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他使更多人買得起房，推動更為廣泛地實施經濟適用房政策。對於區域發展而言，李克強似乎更為關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一勞動密集型區域。對李來說，縮小貧富懸殊比提高經濟效率要緊迫得多。

當面對一些緊迫的經濟問題時，例如中國應該如何應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界壓力、政府應該如何實施經濟刺激方案、如何防止房地產泡沫的擴張等問題，習李之間的優先關注和施政重心上的分歧將可能愈益突出。但是，習李都清楚意識到黨的命運維繫於他們博弈的某種平衡，未來的幾年是他們是否可以擱置內部爭鬥於一旁、攜手帶領中國走出危機的絕佳時機。

各章主要研究議題和結構輪廓

要說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各個競爭者的政治前景已經確定，還為時過早。另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權力從胡溫向習李過渡也並不是一個必然結論。正如美國政治一樣，中國政治中也會有黑馬出現。然而，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應該更加關注更廣泛群體中的潛在權力競爭者，尤其是省部級領導層中冉冉升起的新星。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即將召開的第十八屆黨代會上的人

事變動將標誌著所謂的第五代國家最高領導集體的全面掌權。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一再顯示的那樣，每一代領導人都會帶來可以清楚感知的統治方式、不同的施政方法和帶有個人特性的熱點議題。瞭解中國未來第五代和第六代領導人——尤其是作為未來領導人最重要的後備來源的主要部門和群體——的集體共性或代際特徵，是一項與找出最高領導層的有力競爭者同樣重要的任務。

本書聚焦於中國高層精英的五大主要群體：1) 省級負責人；2) 部級領導人；3) 軍方將領；4) 央企首席執行官；5) 黨務幹部。涉及官員總數為 340 人。這些官員已經掌管著黨政軍企業地方一些最為重要的權力機構。通過對十八大前這些高層領導群體的實證研究，作者不僅揭示了即將陞遷的中南海新主人的特點和權力淵源，同時也展現了中國變化中的精英仕途、晉陞模式和政治版圖。

第一章研究中國 31 個省級行政區的 62 名省級負責人——黨委書記和行政長官。省級負責人或許是觀察中國正在上演的權力角逐的最重要群體，因為中國的省級領導層既是國家領導人的訓練場，又是不同政治力量的角鬥場。省級層面的權力派系分配與國家層面一樣鮮明。中國的省級負責人在當前的國家治理中承擔著巨大的政治比重，這有三個原因。首先，這些領導人管理下的省或直轄市都是大型社會經濟體。可以說一個省對中國而言就相當於一個國家對歐洲而言。其次，中國的省級領導層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力量。近年來，省級負責人時常參



習近平將成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他對市場自由化和深化發展私有經濟的熱衷在國際商界裡眾所周知。他把政策關注點更多的放在了提高經濟效率、保持GDP高速增长、擴大市場開放和促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之上。習近平特別在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財富精英階層。

與政治社交、政策遊說、在他們自己之間和中央權力之間建立聯盟。再有，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省級負責人的職位一直是進入國家領導層的關鍵跳板。

第二章聚焦國務院的 35 名主要成員。國務院成員不僅在政治局中佔有大量席位，國務院的很多核心人物——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都工作在中國內政外交事務的第一線。當然，黨掌握著最終決定權，但國務院是



李克強將接任總理。他較為關注弱勢群體和陷於困境的失業人群。他意識到了建立一個覆蓋城鄉的社會基本安全網的重要性，並從提供基本醫療開始，著手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對李來說，縮小貧富懸殊比提高經濟效率要緊迫得多。

許多重要政策決議的發源地。如果要預測中國的政府政策（包括貨幣、貿易、工業、環境、能源和外資等方面），那麼就必須考慮即將發生的國務院領導層過渡。重新洗牌之際，這 35 名國務院成員的身世背景、職業生涯、教育資歷和派系歸屬究竟如何？溫家寶總理和幾名政府高級領導人將在十八後相繼退休，後溫時代的國務院會怎麼樣？誰會加入？誰會退出？誰會晉陞？中國民眾以及外界針對此次政府更迭的主要關切是什麼？新一屆領導團隊

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是什麼？

中國的政治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的關係歷來是中國問題觀察家們的核心關切之一。儘管過去二十年間政治領導層對軍隊的控制從未受到過嚴重挑戰，但是多種因素都可能在未來數年中有助於強化軍方的影響力和權力，例如文職官員集體領導層效率低下，社會局勢日益緊張，公共抗爭不斷加劇，中國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大國情結愈演愈烈。2012年即將到來的政治更替預計將導致文職和軍隊領導層兩者都出現大規模權力交接。本書第三章根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軍方57名現任最高級將領的深入分析，試圖回答以下重要問題：誰最有可能成為黨的十八大上軍方最高領導層的候選人？中國軍方中這些正在崛起的新星有什麼群體特徵？秘書和“太子黨”出身的軍官和非秘書或“太子黨”出身的軍官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今後幾年中是否會愈演愈烈？分析誰將進入和誰將退出中央軍委能否揭示中國軍隊現代化前進的方向？對中國最高層官員的職業背景和政治網絡的分析能幫助揭示軍方和文職精英之間新的互動和他們可能面臨的挑戰。

國有企業首席執行官在近兩屆中央委員會年輕一代中的閃亮登場，反映出當今中國精英選拔的一個重要趨勢。隨著中國旗艦央企在國內外經濟中變得日漸強大和自信，這些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權力角逐中變得更加積極主動。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的主要構成人員是以上三章研究的其他

三個精英群體（省級負責人、國務院部長和軍隊領導人），相比之下，中國大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在國家領導層中的比例仍然相對較小。但很顯然，更為年輕、具有商業頭腦、有著廣泛政界人脈、具有全球思維的中國首席執行官近來正成為中共領導層的新鮮血液。這一發展不僅可以拓寬中國共產黨政治精英的選拔管道，而且還可能極大地改變未來幾年中國精英政治的遊戲規則。第四章聚焦中國目前 130 位央企的第一把手，包括國資委領導下的 121 家央企，以及 6 家國有商業銀行和 3 家國家控制的保險公司的最高領導者。針對這一迅速崛起並個性鮮明的精英群體所作的實證研究，可能牽涉當今中國最具爭議性的一些問題，並對這些問題有所啟示。這些問題包括公眾對國家壟斷的批評、特權企業利益集團在決策中的作用以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致力於在全球的擴張。

第五章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黨務幹部，或者說職能機構官員。這個群體包括幾個重量級的最高領導層競爭者，在中共領導層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更新換代之時，其作用尤為重要。這些黨務幹部事實上控制著中國政治體制最重要的兩個職能領域：組織和宣傳。中央組織部監督和協調黨的 5 個領導層級（鎮、縣、市、省和中央）的幹部調整，調整從 2011 年年初已經開始，直到 2012 年秋季黨的十八大結束。這一過程涉及數量龐大的中共官員，他們將被較年輕的同事們取代。同時，如何讓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對中國大眾來說更有意義，或者至少對黨的

各層領導官員們有意義，是對黨務幹部尤其是中央宣傳部的官員的一個重大挑戰。近期媒體控制的收緊和老式的“毛式主義”的宣傳再次出現（體現在重慶的宣傳狂熱中，而部分最高領導人默許這種做法），似乎反映出在黨不斷努力加強的僵化意識形態和一個多元化加劇、變化迅速的社會之間，鴻溝越來越大。本章從個性特徵、職業生涯差異、派系歸屬和政治地位等方面分析了 56 名最高級黨務幹部。該章還討論了 90 歲的中國共產黨在其掙扎求生存和努力復興過程中的一系列相互競爭的統治機制。

習近平和李克強面臨的艱巨挑戰

關於中國即將到來的政治承繼，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習近平和李克強這兩名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內定繼任者能否適應他們的核心領導角色？2009 年秋天，習近平未能如廣泛預期的那樣獲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這似乎反映出至少某些最高級領導人或政治領導層內的某些利益集團對他還存在疑問和保留。習近平在 2010 年秋天獲任該職，並將在 2012 年成為胡錦濤總書記職位的繼任者，但公平地來說，與第五代領導人中其他的傑出人物相比，他的能力和領導才幹還有待檢驗。習近平的某些言論（例如在 2009 年訪問墨西哥期間他批評西方政治家“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嚴厲評論）甚至被很多中國博客視為“不懂外交”和“不

像政治家”。(注 4)

至於李克強，有人擔心他既沒有朱鎔基的政治勇氣，又缺乏溫家寶的感召力和人情味。朱鎔基和溫家寶在擔任副總理時甚或在職業生涯早期就以領導才能和管理成就而聞名。溫家寶曾在 3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手下擔任辦公廳主任，其中有兩人都被罷免，但他不僅成功地生存下來，而且不斷陞遷。更讓人驚歎的是他從未背上過背叛領導的惡名。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前總書記胡耀邦，其中披露自從 1989 年胡耀邦去世之後，他每年春節都去看望胡耀邦的家人，這一切都說明了總理為人處世的誠實和正派。(注 5) 還有更有趣的一點需要提到，那就是溫家寶在成為總理之前就已擁有廣泛的行政管理經驗：協調權力移交、指揮 1998 年的抗洪行動、監管全國農村事務、監督金融和銀行改革。溫家寶作為出色管理者的才能和作為政治聯盟協調的角色解釋了他傳奇般的生存和成功經歷。此外，溫總理在國內外廣為聞名的就是他對自然災害和其他危機的迅速回應。例如，過去十年間中國每一次發生大地震或大災難時(包括他還是副總理或書記處書記的時候)，他總是最迅速地趕到災區。

相比之下，李克強則以其對危機的緩慢反應著稱，包括 2008 年的四川地震和 2010 年早些時候的玉樹地震。可能有人會認為作為正在崛起的新星，他需要小心謹慎，避免吸引過多公眾關注，但對於其他領導人(比如擔任副總理時期的朱鎔基和溫家寶，以及擔任省級領導人時期

的王岐山)而言,情況卻並不是這樣。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長期間,該省曾因“艾滋村”、煤礦爆炸和氾濫的各種假冒偽劣商品而聲名狼藉。在河南的艾滋村方面,只是在副總理吳儀訪問了部分此類村莊之後,李克強才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愛滋病活動家和非政府組織對李克強作為省級負責人而未採取行動一直詬病有加。(注6)

當然,李克強也有他的長處。他出身一般家庭,為人低調,接受過正規的法律教育,熟悉經濟事務,以忠誠著稱,擁有強大的政治網絡(共青團體系),尤其是擁有廣泛的省級領導經驗,這一切都是出任總理的良好準備。但是我們很難找出他擔任省級負責人或副總理時有何重大成就。在他的副總理任期內,他一直負責主要部委的結構改革(大部委改革),但這項任務似乎毫無進展,與朱鎔基擔任副總理時的機構重組帶來的中央政府大量的人事變動和效率提高形成了鮮明對照。最近,李克強承擔了治理國家房地產泡沫的領導角色,時間將會辨明他能否從這以艱巨任務中獲得政治資本。

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在中國公眾眼中李克強可能顯得太“軟弱”,甚至比目前的溫家寶總理還軟。最近廣受關注的是,國務院在控制省、直轄市甚或重要的國有企業方面正變得越來越無能為力。最近流行一句話“總理管不了總經理”,這反映出了中央政府管理能力上的嚴重問題。(注7)擁有這種軟弱形象的新總理將難以滿足對協調實施所有政策決議的更有效、更務實的中央政府的需要。

絲毫不足為奇，中國政治領導層內有些人認為李克強應當將總理職位讓給以強硬著稱的王岐山，而李克強可以去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這一職位嚴格來講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但曝光率少很多。（注 8）這種安排的問題在於習近平和王岐山將成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繼任者，而他們兩人都是“太子黨”，考慮到當今社會對“太子黨”和政治裙帶關係日漸憎恨，這種安排可能會引起中國公眾的強烈不滿。並且，十八大前夜第五代領導人大換位會被國內外解釋為中共權力轉移的重大危機並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

所有這些複雜的政治考量可能都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腦海之中，包括胡錦濤、溫家寶和仍有影響力的精英聯盟庇護者江澤民、曾慶紅和朱熔基等。這些揣測和關切幾乎肯定會催生高度的變數和急迫感，催促他們在中國精英政治的十八大前角逐中提升各自領導聯盟或派系的利益。

中國高層的這種權力對壘和輪替機制，可以帶來健康的政治活力，從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權過度。更重要的是這種政治機制不會停滯不前，而且這種不斷變化的機制會使政治遊說變得更加透明，派系政治變得更加合法，選舉也變得更加頻繁和真實。中國的社會階層，無論是快速增長中的中產階級，還是不願邊緣化的民工階層；無論是全球化時代成長的青年學生，還是數量眾多的退休老人，都會更多的參與國家政治。媒體的商業化革命也

會使中國政治日益透明。果然如此的話，不難想像再過約10年到15年的黨內兩派合作共存之後，中國共產黨將沿著“平民派”和“精英派”之間的界限使黨內派系競爭公開化、合法化或共產黨高層分裂為二，走向多黨制。今天一些相當有活力的民主國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一黨統治的過程，並在執政黨內不斷經歷動態的派系調整和制衡。主要因為這種制度演變的漸進性，這種裂變也許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實現，果真如此，將是中國以及世界的福祉。本書對中共高層領導群體的實證研究和派系淵源的分析將有助於前瞻中國未來的走向。

注解：

1. 詳細討論參見李成，《中式民主的啟動》，刊於《金融時報》中文網絡版，2010年1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51>.

2. 溫家寶：解決經濟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問題。《求是》，第七期，2011年4月1日。<http://kaiwind.com/xwzc/chinanews/sz/201003/t108149.htm>。

3.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2009年9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18/content_12076251.htm。

4.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 2009 年訪問墨西哥時曾發表如下言論：“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有什麼好挑別的？”引文根據約書亞·庫伯·拉姆 (Joshua Cooper Ramo) 所著《胡錦濤之行：尋找推進美中關係之路》，刊於《時代》(2010 年 4 月 8 日)，亦可參見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8640-5,00.html>。

5. 傑森·迪安 (Jason Dean)《中國頌詞揭露共產黨陰謀》，刊於《華爾街日報》(2010 年 4 月 15 日)，亦可參見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628704575185861979803430.html?KEYWORDS=JASON+DEAN>。

6. 根據作者對北京的非政府組織和愛滋病活動家的訪談。

7.《世界日報》，2010 年 4 月 19 日，A10 版。《世界日報》，2010 年 4 月 19 日，A10 版。

8. 南雷《逐鹿十八大》(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年)，第 9 頁。